

改革开放与政府效率

唐天伟^a, 谢童平^b, 陈紫薇^c

(江西师范大学 a. 管理决策评价研究中心; b. 经济发展研究院; c. 财政金融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政府效率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政府效率源于行政效率,是政府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较及数量关系,具有经济与社会双重价值取向;评价政府效率主要从定性与定量两方面展开,重点考察政府自身建设,比如政府机构改革、公务员队伍建设、政府规模与机制等,以及政府履职情况,包括政府公共服务、居民经济福利等;影响政府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主客观因素;完善政府效率研究需要不断拓展研究视角、改进研究方法;提升政府效率不仅需要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而且需要遏制政府过度投入、改进基本公共服务、增进居民经济福利、加强政务信息化建设等。

关键词: 改革开放; 政府效率; 研究综述; 内涵及评价

中图分类号: F812.45; F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18)06-0020-06

一、引言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积极促进了我国政府效率提升。从某种层面上讲,改革开放历程就是我国市场不断开放、政府机构不断改革、政府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据中国经济网2014年3月14日报道,在2013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开始之前,按照政府审批流程,一个企业投资项目从获得土地到办完手续,需要办理30多项审批、盖上百个公章,全程最少需要272个审批工作日;而到2017年,企业投资项目从立项到验收完成流程审批事项,最快只需30个工作日,减少了242个工作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包括政府效率在内的效率追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从某种角度看,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在于我国各行各业对效率及政府效率提升的强烈愿望。因此,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特殊时刻,系统梳理政府效率研究对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及参考价值。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有关政府效率研究主要阐述了政府效率内涵、评价、影响因素、提升路径等。以下将分别予以综述。

二、政府效率内涵

探讨政府效率内涵是政府效率研究的首要方面。政府效率最初被称为行政效率,起源于1887年威尔逊的名作《行政学研究》,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政府怎样高效地履行职责”,首次界定行政效率是以最低成本实现最高效率^[1]。Hindy(2007)认为效率是输出与输入的比或结果与资源比的最大化,是评价古典时期行政绩效的唯一标准^[2]。但是,行政效率的定义在西方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有关行政效率内涵研究在争论中不断发展,产生了两大学派:一类是从“量”的角度界定效率,即政府付出的代价与取得的成果之间的比率,要求政府活动追求投入与产出的最优化;另一类是从“质”的角度论述效率,是公众受益度和政府影

收稿日期: 2018-10-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省级政府效率损失及规避机制研究”(17AGL022)

作者简介: 唐天伟(1966-),男,重庆开县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管理决策与政府效率评价;

谢童平(1994-),女,江西宜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管理创新;

陈紫薇(1996-),女,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政策与政府规制。

响度的综合,主张政府活动追求一定社会价值。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者借鉴国外研究成果,认为政府效率也是行政效率。夏书章(1985)指出行政效率的高低有一定的数量比例,但有质的规定性,可作定性分析,通常表现为社会效益^[3]。刘东汶和黄钜鸿(1998)认为政府效率是行政机构和人员在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事物的行政活动速度的快慢以及行政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4];唐任伍和唐天伟(2004)将行政效率拓展为政府效率,在国内第一次系统定量研究政府效率,指出它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既具有政府活动的投入产出比率的一般效率含义——经济学意义上的数量标准涵义,又具有社会学上的质量指标涵义^[5]。陈潮升和雍继敏(2005)提出政府效率的定义实际包含了两项内容:一是政府成本与政府收益的比率,二是正当的目的与手段,强调社会效益结果正当性的价值取向^[6]。解垚(2007)和骆永民(2008)论述政府效率是政府机构在履行政府职能过程中所涉及的财政投入与财政效果的相对比较,即政府成本与政府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7][8]}。祁毓和郭均均(2012)则认为政府效率包括政府提供服务的质量与公正性、政府财政的稳定性和政策的一致性^[9]。陈晓玲和李小庆(2013)阐述政府效率表现为政府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有效消除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的效益及效果^[10]。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有关政府效率的内涵研究主要论证三方面观点:一是从行政效率层面定性研究政府效率;二是政府效率与行政效率相似,都是质和量的统一,是政府投入与产出在数量上的最大化概念,但具有社会基本价值取向;三是唐天伟(2016)^[11]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或者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与产出角度界定及量化政府效率及政府技术效率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

三、政府效率评价

在探讨政府效率内涵基础上,已有文献注重评价政府效率。首先,符祥青和孔杰(1990)、应丰远(2015)等学者基于定性分析,评估我国政府效率现状,指出政府组织自身因素,包括政府机构冗余复杂、行政人员素质不高、政府行为、体制不规范等是导致我国政府效率水平低下的变量^{[12][13]}。

其次,朱火弟(2003)通过指标测度分析研究政府管理过程中的有关投入成本与产出收入,揭示了政府效率所涉及的政府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定量关系^[14];唐任伍和唐天伟(2004)利用指标测度分析法构建由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电子政务等组成的指标体系,然后对全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效率进行评价及排序^[15];何平等(2007)设计综合指标体系,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效率^[16]。

再次,利用非参数及DEA(数据包络)模型实证分析公共部门及地方政府效率。Afonso et al.(2005)在研究公共部门效率时使用非参数生产前沿技术测量各国公共部门的投入和产出效率^[17]。Osei et al.(2005)使用了DEA方法估计非洲国家加纳17个地区医院和17个保健中心的效率^[18]。Afonso et al.(2006)用两阶段法估计教育生产过程的半参数模型,通过比较25个国家的教育系统的产出来评估教育支出的效率问题^[19]。陈诗一和张军(2008)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测算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并计量检验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20]。龚锋(2008)运用DEA方法实证评估2005年中国内地70个大中城市公共安全服务的供给效率^[21]。冯涛和李湛(2009)采用DEA方法中的MPI指数计算我国政府效率及变迁^[22]。唐齐鸣和王彪(2012)利用SFA(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我国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23]。Rachida et al.(2014)使用传统的非参数方法(DEA和FDH),结合使用bootstrap的偏差修正衡量摩洛哥各自治市的效率^[24]。Droumpas et al.(2014)利用公开的财务报表会计数据、采用DEA模型评估希腊地方政府效率^[25]。Inhee et al.(2018)利用DEA模型考察大韩民国42个中央行政机关的电子政务效率^[26]。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围绕政府效率评价,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三方面内容:一是结合政府效率影响变量定性分析、评价政府效率现状及问题;二是根据政府效率,特别是地方政府效率内涵及其影响因子,建立指标体系测度地方政府效率;三是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及其相关模型,建立政府投入、产出变量定量评估政府效率。目前,采用指标测度法或者DEA模型,特别是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或者投入产出指标已经成为定量研究政府效率的最主要方式,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地方政府效率评价与分析实践。

四、政府效率影响因素

不论是前文界定政府效率、评价政府效率,还是后面论述政府效率提升对策始终离不开对政府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有关文献探究了影响政府效率的主客观因素,比如经济增长因素、社会发展因素、政府自身建设因素等。这些因素不但丰富了政府效率内涵、构成了政府效率评价指标,而且明确了政府效率提升方向。

第一,经济增长因素是影响政府效率的重要客观因素。作为公共资源的主要配置者,政府对经济增长情有独钟,各地方政府长期追求项目投资、GDP 等方面的锦标赛,就是经济增长因素影响政府效率的有力佐证。研究证明,人均 GDP 和外商直接投资会对政府效率产生直接影响。LaPorta et al. (1999) 使用横截面数据发现人均 GDP 会对政府效率产生影响^[27]; Afonso et al. (2006)、孙德梅等(2013) 等认为人均 GDP 对政府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9][28]}; 而 Borger et al. (1994)、唐齐鸣和王彪(2012) 却持相反观点^{[29][23]}。同时,外商直接投资(FDI) 也会影响政府效率。张有德(2011) 实证分析地区市场化程度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政府效率的影响^[30]; Afonso 和 Schuknecht(2005)、解垚(2007)、高翔和黄建忠(2017) 等发现,FDI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效率^{[17][7][31]},而祁毓和郭均均(2012) 研究发现,FDI 则降低政府效率,与政府的规模效率负相关^[9]。

第二,社会发展因素,比如人口密度、居民受教育程度等也是影响政府效率的重要客观因素。Grossman 等(1999)、Haunter(2010) 等提出,地方政府辖区的人口密度越大越有利提升其政府效率,即证明人口密度大小与政府效率高具有正相关性^{[32][33]}。同时,也有文献指出人口密度与政府效率负相关。比如,Rachida et al. (2014) 研究表明人口规模与政府效率分值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24]; Doumpos et al. (2014) 分析也证明,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其政府效率较高^[25]。此外,居民受教育程度会对政府效率产生正面拉动作用。Kathy et al. (1998)、Afonso et al. (2006) 指出,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地方政府效率越高^{[34][19]}。

第三,除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客观因素外,政府自身建设这一主观因素也是影响政府效率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有文献注重从定性、定量方面论证政府自身建设对政府效率的影响,诠释二者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中期,学术界主要是从定性层面阐释这一问题。曹晓光(1986) 指出,我国行政机构的结构、管理效能及行政人员的素质影响我国行政效率,其优劣程度直接关乎政府效率水平的高低^[35]; 顾杰(2000) 认为,制度资源短缺、行政理念错位、公共服务社会化程度过低等政府自身建设因素是制约我国政府效率低下的瓶颈及影响我国政府效率提升的深层因素^[36]; 乔燕等(2006) 证明,制度设计、管理者能力、政府管理主客体双方的互动性、行政组织文化等是影响政府效率的主要因素^[37]。

在定性分析政府自身建设因素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定量探究这一因素对政府效率的影响。唐天伟等(2007) 实证分析证明,政府体制创新、职能转换与效率提升之间具有比较显著的相关性^[38]; 陈宝和李湛(2011) 实证研究发现影响政府效率改进的政府自身因素包括政府投入、社会政策、医疗卫生服务和法制建设等^[39]; 才国伟和张学志(2012) 实证检验表明政府层级错配等政府自身因素也会降低政府效率^[40]。同时,国外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Doumpos et al. (2014) 定量分析表明,更加独立于国家补贴的较大城市政府、地方政府运营资产基础设施程度较低、官僚机构较少、政府领导力较强等政府自身因素也会促进政府效率提升,并与其具有正相关性^[25]; Inhee et al. (2018) 定量结果显示,完善的信息化、电子化等设施条件,即以民为本的政府科技服务整合、系统建设的资讯科技投资、独立的资讯科技集成中心等电子政府建设因素是影响电子政务与政府效率的最重要因素^[26]。

因此,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客观因素,政府自身建设等主观因素共同作用于政府效率,成为影响政府效率的主要因素。

五、政府效率研究提升空间

除了注重研究政府效率内涵、评价、影响因素等内容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有关文献也阐述了政府效率研究不足,论证了深化政府效率研究及提升政府效率的对策。

(一) 政府效率研究不足及思考

文献梳理表明,我国政府效率研究还存在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有待拓展。已有文献主要考察地方政府效率,注重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等某一方面探究地方政府效率,而有关中央政府效率、政府

部门效率、政府效率损失等方面研究不足。因此,陈宝和李湛(2011)指出,进一步拓宽政府效率研究视角,综合考察中央政府效率、各级政府机关部门效率等是政府效率未来研究方向^[39]。同时,从相反视角,即从政府效率损失方面探究政府效率也是今后研究重点。

二是研究方法有待完善。唐天伟(2016)指出,研究政府效率的方法主要是指标测度法、以DEA(数据包络分析)为代表的非参数方法。但是,指标测度法所涉及的政府效率测度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41]。同时,除了DEA外,已有文献很少运用SFA模型对地方政府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刘孝萍(2013)提出应考虑运用DEA和SFA两种不同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效率进行跨年度比较研究^[42]。

(二) 进一步提升政府效率的对策

在论述政府效率内涵、评价分析政府效率及影响因素基础上,相关文献从两大方面阐明了进一步提升政府效率的对策。

一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持续提高政府效率。前文指出,政府自身建设是影响政府效率的重要因素。为了提高政府效率,符祥青和孔杰(1990)要求简政放权、精简机构、提高行政人员素质^[12];Broyles R W(1992)认为应重视行政补充、改变行政组织的复杂性、提高行政人员生产力^[43];唐天伟(2009)主张加强政务人员队伍建设、保持政府规模适度^[44]。同时,针对政府行为不规范、官僚主义等造成的效率低下问题,Okello(1998)、赵合云(2018)指出,规范政府支出管理、增加财政透明度、利用现有资源增加政府产出,能够提高政府服务效率^{[45][46]};陈洪生(2004)、Bai(2011)指出,建立企业化政府、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改革、依法行政、改善区域创新环境,有助于提高政府效率^{[47][48]};Ortega(2017)、丁捷(2018)提出,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解决收入分配公平、建立更称职的官僚机构、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等,能够提高政府效率^{[49][50]}。

二是改善影响政府效率及评价的其他因素,诸如遏制政府过度投入与消费、改进基本公共服务、增进居民经济福利、加强政务信息化建设等,有助于提高政府效率。陈宝和李湛(2011)论证了政府投入与政府效率改进负相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与政府效率改进正相关,认为遏制政府投入加速扩大的趋势、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提高政府效率^[39]。同时,唐天伟(2009)认为,包括信息技术运用的电子政务是影响政府效率的主要指标,因此,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提高信息技术在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广泛运用,有助于提高政府效率^[44]。

总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有关政府效率研究文献系统诠释了政府效率内涵,科学评价了我国政府效率现状、深刻剖析了影响政府效率主客观因素、合理论证政府效率研究不足及优化路径。这不但梳理、拓展了政府效率研究理论,而且有助于指导我国持续推进的“放管服”、“最多跑一次”等效率型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改革实践,具有比较重要的研究意义及价值。

参考文献:

- [1] Wilson W.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887, 2(2): 197-222.
- [2] Hindy Lauer Schachter. Does Frederick Taylor's Ghost Still Haunt the Halls of Government? A Look at the Concept of Governmental Efficiency in Our Time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7, 67(5): 74-86.
- [3] 夏书章. 行政管理学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 [4] 刘东汶, 黄钜鸿. 我国行政效率低的原因和对策 [J]. 唯实, 1998(5): 30-32.
- [5] 唐任伍, 唐天伟. 政府效率的特殊性及其测度指标的选择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100-106.
- [6] 陈潮升, 雍继敏. 经济全球化下的我国政府效率探析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5(3): 59-62.
- [7] 解垚. 政府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J]. 财经研究, 2007(6): 101-110.
- [8] 骆永民.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效率影响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8(10): 75-80.
- [9] 祁毓, 郭均均. FDI 会影响地方政府效率吗?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 29(2): 21-36.
- [10] 陈晓玲, 李小庆. 中国省级政府效率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J]. 财贸研究, 2013, 24(4): 118-125.
- [11] 唐天伟.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我国省级政府技术效率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 [12] 符祥青, 孔杰. 影响行政效率的因素及消除的途径 [J]. 探求, 1990(3): 50-51.

- [13] 应丰远. 影响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主要因素及其控制[J]. 法制博览 2015(18): 142 - 144.
- [14] 朱火弟, 蒲勇健. 政府绩效评估研究[J]. 改革 2003(6): 18 - 22.
- [15] 唐任伍, 唐天伟. 政府效率的特殊性及其测度指标的选择[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100 - 106.
- [16] 何平平, 唐任伍, 马骥. 我国省级政府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与评估[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5): 68 - 71.
- [17] António Afonso, Ludger Schuknecht, Vito Tanzi. Public sector efficiency: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Public Choice 2005, 123(3-4): 321 - 347.
- [18] Osei Daniel, d' Almeida Selassi, George Melvill O, Kirigia Josés M, Mensah Ayayi Omar, Kainyu Lenity H.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public district hospitals and health centres in Ghana: a pilot study[J]. Cost Effectivenes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2005 3(10): 9.
- [19] António Afonso, Miguel St. Aubyn. Cross - country efficiency of secondary education provision: A semi - parametric analysis with non - discretionary inputs[J]. Economic Modelling 2006 23(3): 476 - 491.
- [20] 陈诗一, 张军.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 1978—2005[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4): 65 - 78 + 206.
- [21] 龚锋. 地方公共安全服务供给效率评估——基于四阶段 DEA 和 Bootstrapped DEA 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8(4): 80 - 90.
- [22] 冯涛, 李湛.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效率改进的数量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0 25(1): 3 - 8.
- [23] 唐齐鸣, 王彪.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 2012(2): 48 - 60.
- [24] Rachida El Mehdi, Christian M. Hafner. Local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e Case of Moroccan Municipalities[J].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2014 26(1): 88 - 101.
- [25] Michael Doumpos, Sandra Cohen. Apply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on accounting data to assess and optimize the efficiency of Greek local governments[J]. Omega 2014 46: 74 - 85.
- [26] Inhee Seo, Yonghee Kim, Jeongil Choi. Assessment of efficiency in public service - focused on Government 3.0 case in Korea[J].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2018 29(9-10): 1161 - 1184.
- [27] La Porta, R., Lopez - de - Silanes, F., A. & Vishny, R. W.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9(15): 222 - 279.
- [28] 孙德梅, 王正沛, 孙莹莹.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 2013, 27(8): 142 - 149.
- [29] B. Borger, K. Kerstens, W. Moesen, J. Vanneste.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e efficiency: An application to Belgian municipalities[J]. Public Choice 1994 80(3-4): 287 - 307.
- [30] 张有德. 市场化程度与省级政府效率[J]. 开发研究 2011(4): 46 - 48.
- [31] 高翔, 黄建忠. 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进程与中国省级政府效率——基于 Malmquist - Luenberger 指数的实证研究[J]. 国际经贸探索 2017 33(10): 19 - 35.
- [32] Grossman, P., Mavros, P., Wassmer, R. Public Sector Technical Inefficiency in Large U. S.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9 46(2): 278 - 299.
- [33] David Hauner, Annette Kyobe. Determinants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11): 1527 - 1542.
- [34] Kathy J. Hayes, Laura Razzolini, Leola B. Ross. Bureaucratic choice and nonoptimal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Theory and evidence[J]. Public Choice 1998 94(1-2): 197 - 217.
- [35] 曹晓光. 影响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三大因素[J]. 学术交流 1986(5): 42 - 44.
- [36] 顾杰. 论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因素[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00(2): 29 - 31.
- [37] 乔燕, 王丽萍, 黄文勇, 欧阳俊. 行政管理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J]. 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6(3): 49 - 51.
- [38] 唐天伟, 罗纓. 体制创新、职能转换与政府效率提升[J]. 改革 2007(12): 116 - 119.

- [39] 陈宝, 李湛. 中国政府效率改进的影响因素与中国政府改革——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 2011, 33(6): 57–63, 124.
- [40] 才国伟, 张学志. 政府层级错配与政府效率研究[J]. 经济管理, 2012, 34(7): 163–172.
- [41] 唐天伟. 政府效率测度[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 [42] 刘孝萍. 我国地方政府效率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D]. 蚌埠: 安徽财经大学, 2014.
- [43] Broyles R W, Johnson J A, Jones W J. Administrative complement and managerial efficiency in South Carolina hospitals. [J]. Hospital &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1992, 37(3): 373–386.
- [44] 唐天伟, 许才明. 我国政府技术效率的主要症结及优化[J]. 中国流通经济, 2009, 23(9): 36–39.
- [45] D. O. Okello, R. Lubanga, D. Guwatudde, A. Sebina – Zziwa. The challenge to restoring basic health care in Uganda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98, 46(1): 13–21.
- [46] 赵合云. 财政透明度、媒体关注与政府治理效率[J]. 当代财经, 2018(1): 36–43.
- [47] 陈洪生. 现代政府效率的评估与提升[J]. 求实, 2004(6): 72–75.
- [48] Bai, Li.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China: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J]. Innovation, 2011, 13(2): 142–153.
- [49] Ortega Bienvenido, Sanjuán Jesús, Casquero Antonio. Determinants of efficiency in reducing child mort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ole of inequality and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J]. Health care management science, 2017, 20(4): 500–516.
- [50] 丁婕. 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研究[J]. 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2018(9): 36–37.

Research on China's Government Efficiency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TANG Tianwei^a, XIE Tongping^b, CHEN Ziwei^c

(a. Research Center for Management, Decision – making and Evaluation; b.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 c. School of Financ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f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shows that the study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in China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Government efficiency originates from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which is the comparison and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input and output and has dual value orientation of economy and society.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is mainly carried out from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spects; focusing on the government's own construction, for example, the reform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service team, the size and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including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s, residents' economic welfare, etc.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include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other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o improve government efficiency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improve research methods. To improve government efficiency, we need not only to continue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and strengthe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but also to curb government over – investment, improve basic public services, improve the economic well – being of resident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affairs.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 up; government efficiency; research overview; connotation and evaluation

(责任编辑: 沈 五)